念炒作，特别要区分是技术创新还是集资创新，不能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  
　　区块链概念这么火，未来会成为又一个“互联网+”吗？  
　　近年来，区块链的发展生态逐渐得到改善与丰富。业内人士认为，拥有国家政策扶持，得到广泛关注和资金支持，区块链技术能实现逐步稳定进步。区块链技术上行前景虽广阔，但对此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尽管眼下区块链大热，但我们仍然认为，它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胡丹青说，区块链概念目前存在虚热，不是热在拿技术解决现实问题，而是热在集资圈钱、炒作估值，尤其是热炒的绝大部分所谓ICO（首次代币发行）都是集资工具创新，跟技术创新无关。  
　　区块链技术确实能创造很大的价值，但一些风险也不容忽视。  
　　“区块链技术还不太成熟，可应用场景比较有限，更应警惕资本市场炒作概念。”何飞说，区块链热潮的背后免不了会有一些搞噱头想投机的公司，他们并没有真正开展业务，只是企图到资本市场捞一笔就走，要谨防由此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真正想开展业务的机构退出市场，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胡丹青建议，对于目前的区块链热，监管部门应更主动地介入，区分是技术创新还是集资创新，鼓励政府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行业参与者共同帮助公众辨识，全面遏制区块链名义下的集资创新，让ICO实际控制人必须为集资行为承担责任。“判断是技术创新还是集资创新的依据其实很清楚，即是否以信任为始，是否通过解决信任问题创造了实际价值。”  
　　今后更好地推广和使用区块链技术，还需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相关法律政策制定等。  
　　王钧认为，共识算法等区块链的核心技术尚存在优化和完善的空间；另一方面，区块链的处理效率还难以达到现实中一些高频度应用环境的要求。目前主流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均发源于国外，国内的区块链技术服务商要耐心地从底层开发做起，做到技术自主可控，争取引领全球区块链技术发展。拥有区块链应用场景的企业，要积极拥抱新事物，同时科学评估上链需求，不能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  
　　何飞认为，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指导有志于投身区块链技术研发应用的企业，同时明确一些区块链适合应用的场景及国家鼓励的领域等。  
　　《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建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法，结合我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情况，及时出台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重大示范工程、“双创”平台建设、系统解决方案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同时，建议国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和用户单位加强联合，加快共识机制、可编程合约、分布式存储、数字签名等核心关键技术攻关。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正从跟跑者、并跑者逐渐变成领跑者。深入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深度拓展先进技术的场景应用，必将成为撬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将引领世界数字经济大潮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微信，晚上睡觉前还在看微信，他们可以用微信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转账，叫出租车，订外卖，买电影票，预约挂号等等。”美国留学生迈克通过社交软件WhatsApp这样告诉他的朋友。  
　　的确，眼下在中国，微信远非只是一个通信软件，它日益成为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用户每天平均超过1个小时的使用时间，移动互联网日益丰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让人不得不对微信所能带动的数字经济巨大发展潜力高看一眼。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爆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既催生了数字经济，同时也帮助传统行业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更好的创新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弯道超车。比如，在贵州偏远的贫困山村，游客照样能使用手机支付，当地的土特产通过电子商务“飞”出大山。  
　　数字经济被认为是近期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的经济活动，很多国家都踏上了数字经济快车道，我们也正迎来数字经济时代。有人判断，现在人们通常把用电量作为衡量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将来“用云量”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正从跟跑者、并跑者逐渐变成领跑者。这有直观的感受——“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多地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外国人赞叹我国的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走在了世界前列，甚至用“新四大发明”来形容；这也有数据的支撑——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每天50亿次百度搜索点击、每天1.75亿次支付宝交易……这些海量数据的时刻刷新，背后是线上线下数字经济的真实脉动。  
　　我国有条件有实力担当数字经济的领跑者。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制定富有远见的发展计划，并且脚踏实地一步步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创新引领、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贯彻落实好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把好顶层设计的“方向盘”，我国的数字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创新为主要引领，我们要当数字经济的领跑者，还必须在基础支撑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例如，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内企业需要好好争取5G标准的话语权；芯片是数字经济的“工业粮食”，我国目前还是世界最大的芯片进口国，自主研发任重道远。在信息化的新阶段，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国还需要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此外，从长远看，前沿技术研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应做好前瞻性布局。  
　　当前，我国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改革主攻方向，深入推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进步，深度拓展这些先进技术的场景应用，必将成为撬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将引领世界数字经济大潮。  
　　区块链的诞生，将大幅降低价值传输成本，又一次极大解放生产力  
　　目前，区块链底层技术还不成熟，基础设施还不完善  
　　区块链难以篡改、共享账本、分布式的特性，更易于监管接入，获得更加全面实时的监管数据  
　　  
　　区块链迅速发展不是偶然，它能极大降低信息价值传输成本  
　　区块链发展如此迅速，背后有深刻的必然性。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成本得到极大的降低，信息传播效率的飞跃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然而现在的互联网也存在固有的缺陷，它更关心的是信息的送达，而不太关心信息的所有权，出现了“数据裸奔”“信息无主”等问题。而有些信息具有很强的价值属性，比如汇款转账信息，这些有价值信息的传递需要依赖第三方来“保驾护航”。因此，目前信息的价值传输成本依然高企。  
　　区块链的诞生，带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曙光。由于区块链公开透明、难以篡改、不依赖中介机构的特点，区块链可以实现安全、高效、低成本的价值传输。人们有望基于区块链建成价值传输的互联网。在价值互联网中，价值传输成本将极大降低，生产力将又一次获得极大解放。  
　　区块链独特的优势，如数据的确权使用、价值的高效传输，可以广泛应用于很多行业，比如金融服务、合同契约、慈善公益、物联网等，区块链将在未来改变很多行业的面貌。  
　　因此，区块链绝非无足轻重的领域，而是国际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最近，区块链概念很火，区块链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那么，爆发就在眼前吗？  
　　我们不应该如此乐观、如此急切。区块链技术诞生以来，尽管技术创新与突破层出不穷，但社会级别的大规模应用实践仍然不足。区块链底层技术不成熟，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状况并没有获得根本改观。  
　　首先，当前主流的区块链系统，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等，其成熟度都不能支撑大规模现实商业场景。其次，在现有系统中，价值往往只能在同一个区块链内进行传递，于是，看起来热闹的众多区块链实践，事实上搭建了更多的价值孤岛，这与区块链“价值互联网”的美好愿景南辕北辙。  
　　然而，区块链底层技术获得实质性突破之前的这个阶段，恰恰是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应该深耕技术，以期通过技术优势在未来的国际区块链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急于在并不牢固的地基上搭建城堡，很可能因小失大。  
　　监管之道在于通过区块链技术本身实现对技术的监管  
　　区块链行业健康发展，亟须科学监管。由于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块链从业人员鱼龙混杂，甚至有的从业者发布一些只有名字、无战略、无团队、无开发的“空气项目”，吸引风险承担能力不足的散户参与其中，这不但是对行业自身的戕害，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2017年9月4日，7部委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于行业内野蛮生长的代币融资行为，将其定性为“非法公开融资”。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监管介入，对后续监管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有观点认为，区块链的匿名性与弱中心化的架构，与现有的监管体系存在某种程度的天然冲突。实际上，两者并不冲突，区块链技术最终必然演化为“监管融入技术”的模式，区块链的难以篡改、共享账本、分布式的特性，更易于监管接入，获得更加全面实时的监管数据。让监管机构本身也参与到技术中去，通过技术本身实现对技术的监管，将最终化解区块链与监管的冲突。  
　　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发力点。处置“僵尸企业”，事关控杠杆、去产能进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目前处置进展到了哪一步？还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破中见立”？本报记者近日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调查。  
　　  
　　处置“僵尸企业”没有绝对的好办法，要依据具体情况，“一企一策”、对症下药  
　　“其实这家企业发展前景挺好的，产品也供不应求，就是管理有问题，经营不善，利润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这才遇到了困境。”江苏泰州市金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明亮告诉记者，他“接手”泰州艾德铝制品有限公司时，艾德正是别人眼中的“僵尸企业”。  
　　艾德公司创办于2010年，是一家铝制品制造、加工、销售企业，主要产品为铝锭，总投资约1个亿，年产值能达到1亿元左右。但由于该企业业主自有资金不足，投资大部分都是靠借款，其中涉及的银行就有7家，涉及金额达6300万元，单纯靠铝锭生产销售产生的利润，不够支付每年不停增加的债务利息，出现连年亏损。  
　　“艾德也想过办法自救，转型做汽车配件生产制造，但销售规模一直做不上来，企业难以为继，逐步变为一家只能靠银行借款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马明亮说，一旦哪家银行停放贷款，艾德肯定就撑不住了，一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怎样才能活下去？作为艾德在江苏兴化农商行的担保人，马明亮所在的金马公司与兴化市正大特钢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商量，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经过调研，马明亮和兴化农商行认为，艾德的产品有发展前景，只要加强内部管理、避免之前的债务纠纷，仍然有很大的盘活可能，于是决定对其进行资产重组。  
　　重组后，金马公司和正大公司担任主要股东，负责企业的生产销售，并继续承担艾德公司在兴化农商行的贷款，原业主退出企业管理。其中，金马公司负责企业生产，正大公司负责企业财务，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同时，为更好地盘活企业，兴化农商行同意增加贷款帮企业解决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截至2017年底，除原有贷款1500万元之外，该行累计新增贷款2000万元用于艾德生产，助企业渡过难关。2017年12月，艾德实现销售500万元左右，利润40万元左右，逐步扭转了亏损局面。  
　　“艾德公司获得新生并逐步化解处置原有债务纠纷，离不开银行的支持。如果没有兴化农商行的不离不弃，艾德肯定缓不过来。”马明亮说。  
　　与艾德公司不同，江苏锦明不锈钢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通过“自救”成功转型的企业。锦明公司设立时，填补了兴化戴南周边地区无镍铁生产线的空白，后来，戴南地区又上了几个同类项目。2013年，受全球及国内需求量影响，锦明公司产品需求量和净利润同比下降，利润空间挤压，盈利能力下降，资金周转放慢，产能出现过剩，加上2014年后原料进口国印尼限制出口红土原矿，部分银行又压贷抽贷，公司生产经营更加艰难。资产负债率从2012年末的35.99%上升到2015年停产前的60%。  
　　“如果还是干高耗能、高污染的事，肯定没出路，得找到一条适合企业长久走下去的道。”锦明公司负责人马吉说。  
　　在银行支持下，锦明公司成功转型成一家当地的固废处置公司，由污染方变成了污染处置方，不仅企业得以生存，贷款风险得到化解，还有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处置‘僵尸企业’没有绝对的好招，还是要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企一策’、对症下药。”兴化农商行戴南支行行长陈余斌认为，在处置过程中，应把握好各家“僵尸企业”形成的真正原因，区别对待各类企业。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要坚决进行市场化处置；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水平先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要组织相关部门，帮一把、扶一把，满足企业的合理需求，引导企业走上正轨。  
　　处置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必“谈破色变”，但也不能“一破了之”  
　　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浙江温州唯一的一家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因过度投资导致资金链断裂，2014年1月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经核查，中城建设账面资产总额15.93亿元，预计可供清偿的资产仅为1.47亿元，其他应收款、股权投资、股东购房款等共计10多亿元基本无法回收；负债总额14.58亿元，其中确认债权为17.1亿元，实际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由于中城建设债务关系复杂，尚有大量在建工程业务，若进行破产清算，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部分将不复存在，处理在建工程时还会付出巨大成本。”温州金融办主任顾威说。  
　　企业不再“谈破色变”，但也不能“一破了之”。  
　　为了解决中城建设遇到的困难，温州创新性地提出“分离式处置，清算式重整”思路，简单地说，就是把资不抵债部分剥离出去，把核心优势资产留下来，新账、旧账分开。  
　　顾威介绍，中城建设虽已资不抵债，但其无形资产、经营规模、品牌效应仍有较大价值，管理人将中城建设全部股权、未履行完合同作为主要标的资产进行转让，公开透明引入战略投资人，以此来实现中城建设最大价值，提高偿债率。将重整与清算有机结合，在重整计划中包含清理内容，剥离不良资产债务，避免了情况继续恶化。“将好的资产留存处置，不良资产债务剥离，实现了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最大化。”  
　　破产不是处置“僵尸企业”的目的，关键是如何盘活存量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企业展现应有的活力。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产业分析师汪伟认为，通过妥善处理“僵尸企业”的债务和资产问题，阻断各类金融资源向“僵尸企业”的新增无效投放，有望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解决好“僵尸企业”无效、低效占用金融资源问题。  
　　“僵尸企业”处置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处置对象复杂、政策支持不足、税费负担过重、破产启动困难等，都是可能遇到的难题。  
　　温州建立了企业破产处置工作府院联席会议制度，将市企业破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与市处置办进行整合，由法院和处置办共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现已召开三次会议，解决了企业在司法破产中涉及税收、信用修复、刑民交叉、企业参与招投标、管理人履职等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主任李世刚认为，目前“僵尸企业”债务处置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够明晰完善，导致企业存在观望情绪，这种情绪不仅体现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相关的地方政策和金融机构也同样在等待国家相关政策及实施细则出台。今后，该完善的政策要完善，该废止的规定要废止，该放宽的限制要放宽，更好地促进“僵尸企业”处置。  
　　重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腾笼换鸟”，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僵尸企业’。”采访中，有不少企业疑惑自己为何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大家对‘僵尸企业’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有人把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画上了等号。”东部沿海某省一家炼钢企业负责人钟鸣说，“谈钢色变”依然存在，与“钢”有关的企业似乎就成了大家眼中的“僵尸企业”，钢铁、炼钢、不锈钢……只要带有“钢”字，似乎就被列入了黑名单。  
　　钟鸣告诉记者，在这些行业，企业遇到不抽贷、不断贷是幸运的，但如果银行把贷款的口子彻底封了，不仅大企业受不了，中小企业可能直接就面临破产倒闭。“前些年，企业间互相担保情况较多，一家企业出现问题后，原本是前景很好的其它企业可能也因此受到牵连，真是有苦说不出。”  
　　“有的企业产品其实市场销路很好，但因为资金链断裂，银行也没有新增资金支持，想转型更难，只能是勉强活着，死也死不了。”钟鸣认为，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本就是两个概念，不能一刀切、不能都避而远之。  
　　什么是“僵尸企业”？汪伟认为，理论上，一般是指自身缺乏造血能力、无望恢复生机、依靠政府补贴或贷款人支持而免于倒闭的企业，但在实际操作评估中如何界定一家企业是不是“僵尸企业”则很复杂。  
　　“判定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无论从资产负债率、清偿能力，还是从停产半年、连年亏损等指标看，都存在一定问题。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以年产量多少为标准，判断是否为该关停或整合的小作坊，那么在贵州这样的地区，由于地域特点，大部分厂子规模并不大、产量也很少，难道全都因此列入关停范围？”李世刚说，企业发展原本就是动态的过程，可能当下存在资金问题，过一段时间又能通过自身能力消化掉。工作的重心不应在认定谁是“僵尸企业”，而是怎么去解决这些企业面临的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汪伟认为，对企业而言，这有利于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效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作用；对金融机构而言，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融资信用风险；对政府部门而言，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培育企业生机活力。短期内，可能会面临一些改革阵痛，但从中长期来看，将促进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生产力有效提升。  
　　“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加快‘腾笼换鸟’的过程。”顾威认为，应当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的“牛鼻子”，摸清底数、政策支持、大力推动。下一步，应继续坚持“一企一策”、对症下药，改造提升一批、盘活重组一批、坚决退出一批，最大限度提升“僵尸企业”处置效率和效益。  
　　政府财政支出虽然数额庞大，但也要像老百姓过日子一样学会精打细算。一项民生支出，只有明确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谁的孩子谁抱养，谁的承诺谁兑现，才可以定蓝图、谋规划，让民生建设的钱有来源、有保障  
　　  
　　“谁请客？谁掏钱？”这句春节宴席上老生常谈的玩笑话，却曾经是困扰不少地方民生建设的“老大难”。近日，随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出台，基本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八大类18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有了法定的“埋单者”。  
　　民生改善，千头万绪，但说到底还是花钱的事。如果民生项目成为空头支票，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获得感，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信用和权威性。办好公共服务项目，兜牢民生底线，关键在于明确财政支出的责任。责不清则事难成，不把掏钱的责任分清楚，公共服务就会出现没人管、抢着管、胡乱管的现象，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承担不够；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却交给地方承担；而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地方没有担负起相应的支出责任。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财政支出虽然数额庞大，但也要像老百姓过日子一样学会精打细算。居家过日子，就要懂得亲兄弟明算账，一项民生支出，只有明确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才好定蓝图、谋规划，才能让民生建设的钱有来源、有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抓住了我国当前民生领域财政改革的关键，既能保障民生支出力度，让老百姓踏实过日子，又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合理的民生改善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一方面，谁的孩子谁抱养。通过设立共同财政事权，并分清各自的支出责任，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将实行按比例分担，并保持基本稳定，从而解决中央与地方部分财政事权不够清晰明确、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权责清晰的基础上，今后9项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统一“国标”，让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站上统一的民生起跑线，民生保障网将更牢更密，社会服务也会更加公平。  
　　另一方面，谁的承诺谁兑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只有让各级政府知道了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才能更好地掂量清楚自己的钱包鼓不鼓。在落实“国标”的基础上，今后地方因地制宜拿出高于国家基础标准的地区标准，高出部分所需资金自行负担。有了财政的“紧箍咒”，各地花钱才不会大手大脚、没有约束，在上马重大民生工程时才会从严把关、谨慎行事，避免决策拍脑袋、实施拉饥荒的尴尬局面。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正是各地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机。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更多可用财力投向民生工程，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让发展更平衡更充分；更要量力而行，严格落实财政预算要求，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定过高的目标，不做不切实际的打算，给老百姓带来稳稳的幸福。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涉及众多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设计，稳步推进。这项改革还在路上，未来还要加快推动其他领域划分改革，并推动形成保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要用科学规范的财政制度，算好民生改善的账，管好政府花钱的手，让财政的每一分钱产生更大的价值，防范可能的财政风险，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打牢根基。  
　　工行推出对公客户智能开户服务  
　　本报电  中国工商银行近日在湖北武汉正式发布对公客户服务的新成果——对公智能开户业务。该业务在工行“企业通”平台的基础上，将大数据和智能设备对接，进一步提升营业网点服务中小企业的效率，客户仅需到网点一次、最快30分钟就可以办完对公账户开立等一系列业务。近年来，工行一直积极探索与国家相关部门合作，利用银行线上线下渠道服务中小企业，深入拓展普惠金融。截至2017年末，通过工行“企业通”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已超过64.6万家。目前，对公智能开户业务已在湖北、浙江、江苏、贵州、四川等10个地区试点推出。  
　　（徐伟）  
　　  
　　新疆银监局多措并举治市场乱象  
　　本报电  2017年以来，新疆银监局通过加强监管信息收集、日常监管分析、风险评估和监管评级等方式，加大风险识别力度，运用审慎会谈、风险提示和“窗口指导”等手段，多措并举，治理市场乱象。2017年，对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新疆银监局发出各类风险预警112次，同时不断加大违法违规“双罚”力度。该局共对54家机构和110名银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罚，罚款金额达1666万元，处罚数量和金额均是上年的4.6倍。通过一系列措施，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规意识不断增强，主要风险得到缓释。截至2017年11月末，存量不合规业务规模下降，同业资产负债占比“双降”。   
　　（欧阳洁）  
　　结构性存款利息是浮动的，其水平不仅取决于存款利率，还与挂钩的资产价格有关  
　　与理财产品不同，结构性存款一般是保本的，本金在存款保险范围内，适合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人  
　　  
　　去年至今，结构性存款悄然走红。不少银行推出多款产品，向个人投资者重点推介。以招商银行为例，近期该行发行的个人结构性存款产品，最高年化收益在4%以上，182天的最高收益甚至高达4.3%左右，城商行和农商行发行的同类产品价格普遍更高，达5%左右，吸引了不少投资者。  
　　什么是结构性存款？据介绍，结构性存款是指在普通存款的基础上，运用远期、掉期、期权或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将投资与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商品价格、信用、指数及其他金融类或非金融类标的物挂钩的金融产品。  
　　结构性存款与普通存款有何差别？普通存款的利息是确定的，而结构性存款的利息是浮动的，产品实际收益水平不仅取决于存款利率，还与挂钩的这些资产价格有关。正是因为引入了一些高收益、高风险的衍生品，所以结构性存款的利息要高于普